

# 香港回歸前夕的中英外交較量

黃鴻釗\*

## 一、撒切爾夫人訪華與中英首腦會談

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歷史把收回香港、澳門，消除殖民主義在中國的遺迹，提到中國政府的議事日程上以後，英國政府接連派出高級官員訪華。1979 年 3 月，香港總督麥理浩訪問北京。接着，外交大臣卡林頓和副大臣阿特金斯分別於 1981 年 4 月和 1982 年 1 月訪華。他們的目的是想摸清中國政府的底細，以便制定對策。阿特金斯訪華期間，趙紫陽總理對他說：中國將捍衛自己對香港的主權。同時將維持香港的繁榮，香港將繼續作為自由港，以及貿易、金融中心。中國打算同香港各個階層討論香港的地位，並且在制定對港方案時，考慮他們的意見。<sup>1</sup> 阿特金斯回國後，立即將這一極其重要的信息送到撒切爾首相那裏，積極為首相的訪華做好準備。

早在 1979 年 11 月華國鋒訪問英國時，曾邀請撒切爾夫人訪華。這時候英國政府獲知中國準備同英國討論香港問題，便正式宣佈撒切爾夫人回訪中國的日期。這位首相在國際問題上一貫奉行強硬政策，有“鐵娘子”之稱。恰好這時候，發生了馬爾維納斯群島事件。3 月 25 日，阿根廷政府出兵收回該島。撒切爾夫人立即派遣一支特混艦隊遠征拉丁美洲，打敗阿根廷，使英國對馬島的殖民統治得以繼續下去。馬島戰爭的勝利使撒切爾夫人大受鼓舞，決心在香港問題上採取強硬政策。

1982 年 7 月 28 日，撒切爾夫人在唐寧街首相官邸召開會議，討論香港問題決策的基調。再過 8 個星期，她就要飛赴北京了。參加會議的官員有駐華大使柯利達，港督尤德，以及外交部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次官亞倫·唐納德。這時首相手裏掌握的資料有：阿特金斯與趙紫陽會談的報告，希思關於中國對香港問題政策的詳細資料。希思於 4 月 6 日與鄧小平會談時，

獲知中國將收回香港的主權，英國將停止對香港的統治。取而代之的是，香港將成立港人治港的政府，香港的社會經濟制度保持不變，以及香港仍是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等等。<sup>2</sup> 應該說，英國政府這時已對中國的政策基本清楚了。問題是，在這種情況下，它準備採取何種對策。對於英國來說，這確實是一個難題。而“鐵娘子”卻決定採取進攻性的方針。在會上，她一開始就擺明觀點。聲稱：“英國是根據三個條約而擁有香港的，其中只有一條是租約，而其它兩條則已將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永久割讓給予英國。中國譴責所有三個條約都是‘不平等的’，宣稱它們是不合法的，因為它們是用武力強加給予中國的。但是，在英國人看來，所有這三個條約都是完全合乎國際法的。據此，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到 1997 年就只有新界需要回歸中國。但如果中國想要收回整個香港，就像鄧小平現在所指的，那麼，惟一的合法途徑就是要取得英國的同意，對兩個割讓條約進行修改。”<sup>3</sup>

但這只是撒切爾夫人一廂情願的想法。港督尤德以及外交部官員提醒鐵娘子注意，中國的態度甚為堅決，可能會強行接管香港，而且是很可能根據比現在準備與英國商討更為苛刻的條件予以收回。因此，如果絕對否定中國的主權，對英國來說，將是“光彩而困難的”。他們想說服鐵娘子同中國達成某種形式的妥協，即英國表示放棄對香港的主權，以換取繼續管治香港的權利。但她反對放棄主權的思想，又找不到有效的應對良策。最後，還是柯利達提出，會談時避開主權問題，而以維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為雙方開始談判的目標。這一建議得到了會議的認可。<sup>4</sup>

1982 年 9 月 22 日，撒切爾夫人到達北京。23 日，她與中國政府總理趙紫陽進行了會談。會談之前，趙紫陽首先主動向記者說：“主權問題當然中國是要收回的，但是，我看主權問題並不影響香港的繁榮和穩

\* 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定。因為中國如果收回主權，一定會採取一系列保證香港繁榮和穩定的措施。”<sup>5</sup> 然後，趙紫陽把中國關於解決香港問題的方案提交給這位首相。中國政府把自己對香港問題的基本立場公諸於世，在外交談判中贏得了主動。24日，鄧小平又同撒切爾夫人進行了會談。他明確指出，中國必須在1997年恢復對香港地區行使主權。在恢復主權時，中國政府將充分考慮這一地區的特殊情況，並採取相應的特殊政策以確保香港的繁榮。在保持香港繁榮的問題上，中國希望能得到英國合作。

然而，撒切爾夫人卻公然聲稱：香港是屬於英國的，這是根據國際法認可的三個條約，而其中有兩個是割讓條約。中國若要合法地收回香港，惟一的途徑就是通過雙方協商來修改條約。她又認為中國不能為香港的穩定與繁榮提供必要的保障。只有英國繼續對香港進行統治，才能提供這種保障。最後她說，如果能對行政管理權問題達成一個“令人滿意的協議”，她就將對香港主權問題“考慮向英國國會提出建議”。她甚至說，如果中國強行收回香港，那就會發生災難性的後果。只有當他們感到“滿意”時，才會考慮中國的主權要求。

鄧小平則堅決地表示，如果同意延續英國的殖民統治，那麼他就同李鴻章之流的賣國賊毫無區別，也必定會遭到中國人民的反對。中國一定要恢復香港的主權，而主權也包括治權。英國國旗必須落下來，英國總督必須離開。中國希望英國在香港回歸問題上予以合作，中國準備就維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問題同英國進行討論。但如果兩年內雙方不能達成協議，中國就將單方面宣佈收回香港的政策。中國希望和平地實現香港的回歸，但如果發生嚴重的波動，中國將被迫重新考慮收回香港的時間和方式，如果說宣佈要收回香港就會“帶來災難性的影響”，那麼中國政府要勇敢地面對這個災難，做出決策。<sup>6</sup> 這些話使鐵娘子愕然不知所措。在雙方會談完畢，撒切爾夫人走出人民大會堂時，發生了因不慎而在台階上失足跌倒的戲劇性插曲。<sup>7</sup>

儘管中英雙方分歧嚴重，但隨後仍發表了一個聯合公報：“今天，兩國領導人在友好的氣氛中，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雙方領導人就此問題闡述了各自的立場。雙方本着維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的共同目的，同意在這次訪問後通過外交途徑進行商談。”<sup>8</sup>

但英國女首相不甘示弱，繼續為保持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權而努力。9月24日，撒切爾夫人在北京

舉行記者招待會上聲稱：“這三個條約(指1842、1860和1898年清政府同英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從國際法來說是有用的，我們現在的一切行動，也是以這三個條約為依據的。”她反覆指出：“我的觀點是這樣：我們遵守我們的條約，如果有人不喜歡這些條約，解決的辦法是由有關雙方進行討論，經雙方同意而生效，但不能毀約。如有一方不同意這些條約，想廢條約，則任何新的條約也沒有信心執行，任何條約都必須遵守。因此我們進行談判，共同目的是維持香港的繁榮。”她從北京到達香港後，又於9月27日對記者說：“英國在香港的地位是根據三個條約的，……英國遵守其條約。”<sup>9</sup> 撒切爾夫人這些話是說給中國政府聽的，無非表明，她不同意中國的立場，而企圖固守三個不平等條約，繼續維護統治香港的權益。

英國首相這些堅持殖民主義立場的談話，在中國引起強烈反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和新華社評論員嚴正指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三個不平等條約是炮艦政策的產物，中國人民不能接受。“英國人民對於一個世紀以前大英帝國的侵略行為是無須負任何責任的。如果今天有人還要堅持這些不平等條約，只能引起中國人民、英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對英帝國主義侵華歷史的回憶”，“撒切爾夫人……談到，英國對香港居民負有‘道義責任’。我們認為，香港問題是事關國家主權和10億中國人民(包括香港的中國居民)民族利益的大事，只有中國政府有權利說，對香港居民負有一個國家的責任。”<sup>10</sup> 她的談話也在海內外引起很大的反響。香港一些輿論批駁所謂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的說法。香港大學生以“侵華條約，不容肯定”的橫幅在布政司署門外示威，學生代表還向英國首相遞交了抗議信。香港《文匯報》發表社論指出：

“《南京條約》、《北京條約》等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英國人可以干涉中國關稅、外貿主權的審議權、領事裁判權、外國人可以自由進入中國城市權、五口通商權，自1949年升起第一面五星紅旗起，早就被中國人民丟到太平洋去了。撒切爾夫人還想中國政府遵守這些條約，豈非重溫侵略迷夢？”<sup>11</sup> 這一切表明，中國人民堅決要求盡快收回香港主權，反對延長英國對香港的殖民統治。即使在英國，撒切爾夫人關於堅持三個不平等條約有效的言論也受到了批評。倫敦國會中許多議員指責鐵娘子態度高傲和不通事理，給香港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對於國會的這些批評，撒切爾夫人沒有進行辯解，又鑒於中國理直氣壯，英國也不敢使用強硬手段，而被迫改變策略，採取了較為現實的態度同中國對話。

## 二、中英談判中的主要分歧

撒切爾夫人和外交部的官員深知，英國最終不可避免地要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但他們不肯立即認輸，而要拚命討價還價，爭取繼續行使對香港的管治權。這種情況，使得中英談判成爲一個漫長的、充滿尖銳鬥爭的歷程。

英國首相訪華以後，從 10 月開始，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文晉(1983 年 1 月由另一副部長姚廣繼任)與英國駐華大使柯利達，繼續就談判基礎與程序問題交換意見。中方要求英方在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之前提下，盡快同中國討論如何維持香港穩定繁榮與移交主權等問題。而英方則要求主權問題只能作爲更廣泛的一攬子交易的一部分來加以討論。由於英國不肯爽快承認中國對香港的主權，直至 1983 年 3 月，雙方仍無法就談判程序安排問題取得進展。

由於中英之間分歧嚴重，開展正式談判又遙遙無期，香港便出現了股市猛跌的現象。在不到兩星期內，恆生指數從 1117 點下降到 820 點，美元與港元的兌換率也從 1:6.1，上升到 1:6.7。物價上漲，工商業混亂。鑒於有人以經濟手段給中國施加壓力，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廖承志宣佈：如果香港出現動亂，不排除提前收回香港的可能性。事實上，香港經濟的不穩定，中國人固然會遭到損失，但英資財團的損失更大。政治不穩定，港英當局的稅收也會減少，而保持香港的穩定與繁榮，不但對他們今天有好處，就是在 1997 年後也有利而無害。

這期間，撒切爾夫人曾於 1983 年 1 月 28 日，召開談判工作會議。會上她提出如果談判不能取得進展，即中國未能滿足英國繼續統治香港的願望時，便應在香港發展民主，在短期內讓香港獨立或實行自治，就像當年新加坡那樣。或者可以考慮在聯合國主持下，就香港問題全民投票，由當地居民公決。<sup>12</sup> 這充分說明，鐵娘子企圖使香港成爲脫離中國的獨立政治實體，以便今後繼續進行控制。但她那些稍微有點政治現實感的同僚們都不敢對她的冒險政策予以苟同。他們認爲，最重要的是防止中國一怒之下撇開英國，自行公佈治港方案，使英國陷於被動應付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英國政府首相於 1983 年 3 月寫信給中國總理，作出了有條件交換香港的保證，信中說：“只要英中兩國政府能就確保香港未來繁榮與穩定所作的行政安排達成協議，並能爲英國議會、香港人民和中國政府所接受，她願向議會建議：整個香港的主權應交回中國。”<sup>13</sup> 這實際上是宣佈放棄了不平等條約繼

續有效的立場。4 月，趙紫陽覆函表示，中國政府同意盡快舉行正式談判。

中英兩國政府經過磋商於同年 5 月底就會談議程達成了以下協議：①爲維持 1997 年後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應作的安排；②爲香港由現在起到 1997 年的安排；③有關政權交接事宜。這樣談判就不從收回香港主權開始，而是從 1997 年以後的安排入手。如果這個問題談好了，收回主權的問題就迎刃而解了。<sup>14</sup> 此後，從 1983 年 7 月 12 日至 1984 年 9 月 18 日，這一年多時間內，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舉行了極其艱苦的 22 輪談判。中國政府代表團先後由外交部副部長姚廣和周南率領；英國政府代表團先後由駐華大使柯利達和伊文思率領，包括香港總督尤德。這次香港談判被人稱爲起步緩慢、較量激烈、逐漸加速的馬拉松談判。

1983 年 7 月 12 日，中英談判開始。本來預定討論港人治港、保持香港穩定繁榮以及過渡時期的任務等實質性問題。但是，英方卻聲稱，香港的繁榮離不開英國的管理，因爲香港人尚未適應民主政治體制，要有一個過渡時期。主張“以主權換治權”，即“在承認中國主權的原則下，由英國像過去一樣管治香港”，從 1997 年起再經過三幾十年，等到香港人具備管理能力之後，方才還政港人。這樣，英國人爲談判設置了一道障礙。主權和治權是統一的，所謂主權就是國家在本國領土上充分地行使管轄權。如果相反，本國領土仍由別國管轄或管理，那還有甚麼主權可說。因此，英國的“以主權換治權”的主張，理所當然地遭到中國的反對。在談判中，中國代表詳細地闡述瞭解決香港問題的基本方針政策，堅持主權和治權不可分割的立場。而在前四輪談判中，由於英方堅持這一立場，使談判一時陷入僵局。這種僵局正是英國造成的。參與談判的一個英國官員曾這樣說：“我們不能接受一下子就認輸的看法。無論我們心裏對最終會出現甚麼情況有甚麼猜想，也決不可能對中國說，‘我們認輸’，就此屈服。”<sup>15</sup> 撒切爾夫人也聲稱“沒有理由在談判初期便承認英國對香港的管治權不會繼續下去”，“希望能用盡手上的每一張牌，去達到最大的效果。”<sup>16</sup>

## 三、僵局的打破與協議的達成

當 1983 年 9 月 23 日第 4 輪談判結束時，新聞公報首次沒有使用“有益的和建設性”等詞句。頓時香港謠言四起，港幣大跌，出現了拋售港幣的風潮，從

19日至24日幾天內，港幣與美元的兌換率從8.1:1下跌到9.5:1，恆生指數也跌至700點。同時金價暴漲，市場混亂，市民搶購物品，擠兌美元。9月24日混亂最為嚴重，被稱為“黑色星期六”。這種現象是港英政府的管理不當造成的，可是他們一面有意識地放任自流，同時又把這種現象歸咎於中國對香港的政策。港英財政司彭勵治、滙豐銀行總經理雷興悟等在港揚言，中國談判立場不改，港元弱勢還會繼續。<sup>17</sup> 彭勵治甚至指責中國銀行將大量港幣兌換成美元，引發了這場危機。

面對英國政府大打經濟牌，向中國施加壓力的做法，中國及時做出反應。9月間，鄧小平針對英國人在香港所搞的小動作，通過來訪的英國前首相希思轉告撒切爾夫人，英國必須改變態度，否則中國將單方面採取行動。10月6日，中國外交部長吳學謙在加拿大宣佈，中英談判的最後期限為1984年9月，屆時如果不能達成協議，中國將單方面宣佈對香港問題的政策。他又指出，中英會談的目的是商討1997年後過渡時期如何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問題。港人治港是中國人的內政問題。10月7-8日，撒切爾夫人在首相府再次召開會議，討論香港談判的對策。會上，柯利達建議做出讓步，以中方的方案為討論的基礎，爭取達成協議。他的建議遭到與會的香港行政局非官守議員的反對。但外交部長杰弗里·豪稱，他在紐約得到吳學謙的當面保證，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後，香港現行的社會、經濟制度將保持五十年不變，香港的前景已較明朗，英資財團將來仍會有所作為。因此他認為，不首先研究中國的建議就準備實行對抗是不明智的。撒切爾夫人也覺得，實行對抗就是冒關係破裂的風險。而中國畢竟不是阿根廷，她不願付出如此高昂的代價。於是，她接受了柯利達的建議。10月14日，英國首相致函中國總理，表示理解中國立場，願意合作，在中國建議的基礎上探討香港的持久性安排。<sup>18</sup> 與此同時，撒切爾夫人與港英政府決定採取干預滙市、穩定港元的措施，恢復實施聯繫滙率制度，取消港元存款利息稅；10月15日，宣佈港元兌換美元的固定滙率為7.8:1，使香港的金融危機終於得以平息。

由於英國政府對香港談判政策的這一轉變，接下來在10月19-20日的第5輪會談中，英方不再堅持“主權換治權”的主張，從而使談判獲得了突破。1984年1月，在新一輪會談開始之前，兩國代表團長分別換人，由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和英國新任駐華大使伊文思出任。三個月後，兩國談判明顯加快。4月15日，英國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訪問北京三天，同鄧小

平等中國領導人進行了會談，“在一些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實質性的進展”。在談判期限上，雙方議定於1984年9月草簽，年底正式簽署協議文本。中方同意從目前到1997年的13年間，香港仍由英國管治；英方則承諾在此期間，“負責絕對以目前的方式去管治香港”，繼續維持其穩定與繁榮，“使1997年時的轉變，盡可能帶來最少的干擾”。屆時英方不會把一個“爛攤子”交回中國。<sup>19</sup> 然而，在中英談判過程中，一些立法局議員企圖介入。1984年3月14日，香港首席非官守議員、葡萄牙人羅保(Rogério Hynd Man Labo)提出動議：任何有關香港前途的建議，在未達成最後協議之前，都必須在立法局進行辯論。該動議當日即為立法局通過。同日，英國外交部發言人立即表示，香港立法局議員有權提出並辯論任何他們認為是適當的問題；將來達成的協議，不僅要為中國和英國所接受，同時也要為香港人所接受。針對這一情況，18日，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指出：英國政府應該珍惜目前中英談判比較順利，香港社會經濟狀況良好這種局面；在今後13年的過渡時期中，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是英國政府的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將在廣泛徵求香港各界意見的基礎上草擬，並再次交香港同胞討論和修改，然後，提交全國人大正式通過，頒佈執行。4月20日，杰弗里·豪在香港發表聲明說：現在可以肯定，“要達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後，仍然繼續由英國管治的協議，是不切實際的設想。”<sup>20</sup> 5月15日，杰弗里·豪又在英國下院說道：“誰也不能忽視的現實是，香港的前途不可分割地同中國這個偉大的具有悠久歷史的國家聯繫在一起”。“英國在1997年後繼續治理香港是不現實的”。顯然，到了這個時候，中英談判已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取得進展。應該說，自此以後，英國才真正表現出達成協議的願望，並持一種比較建設性的態度進行談判。

此後，中英談判真正轉入討論1997年後如何保持香港的穩定和繁榮問題。5月14日，中國總理趙紫陽在全國人大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充分闡明了“一國兩制”的具體方針。至此，中英談判的前途進一步明朗化，香港人心安定，經濟穩定發展，對中英談判起着促進作用。7月27日至31日，杰弗里·豪再次訪問北京，與中國領導人會談，在一系列問題上取得諒解，達成協議。8月1日，杰弗里·豪從北京飛抵香港後發表聲明，宣佈中英雙方將於9月草簽協議，成立中英聯合聯絡小組。這年9月5日至18日，雙方舉行最後一輪會談，本着友好合作和相互諒解精

神，共同擬定聯合聲明的文本，中英雙方經過艱苦的22輪談判，終於取得可喜的成果。

1984年9月26日，中英兩國政府代表團團長周南和伊文思在北京草簽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以及三個附件，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的具體說明》、《關於中英聯合聯絡小組事宜的若干規定》、《關於土地契約問題的規定》，還有雙方準備交換的備忘錄各一份。兩國代表團長在簽字儀式上互致祝辭。北京、倫敦和香港三地就在草簽的當天同時發表了聲明和附件的全文。英國政府發表了關於香港問題達成協議的白皮書。中國《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具有歷史意義的大事》的社論，指出：“這個聯合聲明確認了我國將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同時，還指出了使香港保持穩定和繁榮的各種安排。這樣，歷史上遺留下來的香港問題就獲得了圓滿解決，香港處於外國統治下的不幸歷史將要宣告結束。中國人民遭受的歷史恥辱將得以洗雪。”社論又說：“香港問題的圓滿解決，不僅可以醫治中英之間歷史遺留下來的創傷，而且必將使中英關係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兩國的友好合作一定會有更大的發展。”

1984年12月19日，中英兩國在北京舉行《中英聯合聲明》的簽字儀式。趙紫陽和撒切爾夫人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後先後致辭，對聯合聲明給以高度評價。趙紫陽說：“《聯合聲明》的達成，是我們兩國共同努力的成果。”撒切爾夫人說：“《聯合聲明》在香港生活史上，在英中關係的歷程中以及國際外交史上都是一個里程碑。”<sup>21</sup>

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於1985年2月27日和3月28日，分別被英國國會兩院批准。4月10日，又被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所批准。5月27日，中英雙方在北京互換聯合聲明批准書，標誌着中英協議已經生效，香港從此進入過渡時期。

中英兩國通過談判解決香港問題，在全世界引起了熱烈的反響，認為這是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楷模。聯合國秘書長佩雷斯·德奎利亞爾指出：“在緊張和對抗不幸地籠罩着世界的許多地區的時候，對香港未來地位的談判取得成功，將毫無疑問地被認為是在當前國際關係中有效的、靜悄悄外交的一次突出的範例。”

## 註釋：

<sup>1</sup> 羅拔、郭瞳：《香港的終結——英國撤退時的秘密談判》，香港：明報出版社，1993年，第94頁。

<sup>2</sup> 同上註，第98頁。

<sup>3</sup> 同上註，第98-99頁。

<sup>4</sup> 同上註。

<sup>5</sup> 見《文匯報》，1982年9月24日。

<sup>6</sup> 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15頁。

<sup>7</sup> 同註1，第125-129頁。

<sup>8</sup> 黃鴻釗：《中英關係史》，香港：香港開明書店，1994年，第281-282頁。

<sup>9</sup> 元邦建編著：《香港史略》，香港：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年，第285頁。

<sup>10</sup> 《我們對香港問題的嚴正立場》，載於《人民日報》，1982年9月30日。

<sup>11</sup> 《收回主權依法有據》，載於《文匯報》，1982年10月6日。

<sup>12</sup> 瑪格麗特·撒切爾著，李宏強譯：《唐寧街歲月——撒切爾夫人自傳》（上、下），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第88頁。

<sup>13</sup> 同上註，第489頁。

<sup>14</sup> 見《鏡報》，1983年7月10日。

<sup>15</sup> 同註1，第142頁。

<sup>16</sup> 同註12，第489頁。

<sup>17</sup> 古星輝：《古星輝論香港》，香港：香港鏡報文化企業有限公司，1987年，第37-39頁。

<sup>18</sup> 同註1，第130頁。

- <sup>19</sup> 余繩武、劉蜀永主編：《20世紀的香港》，香港：麒麟書業有限公司，1995年，第273頁。
- <sup>20</sup> 香港新聞處：《杰弗里·豪在香港記者招待會上發表的聲明》，1984年4月20日。
- <sup>21</sup> 同註8，第288頁。